

中共党史非常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刘金田 张爱茹 著

影响世界改变中国的

A close-up portrait of Deng Xiaoping,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A white rectangular box obscures the lower part of his face.

邓小平

台海出版社

中共党史非常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刘金田 张爱茹 著

影响世界改变中国的

那十年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响世界改变中国的邓小平:中共党史非常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 刘金田, 张爱茹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168-0316-5

I. ①影… II. ①刘… ②张… III. ①邓小平(1904~1997)-传记
IV. ①A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1348 号

影响世界改变中国的邓小平:中共党史非常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著 者: 刘金田 张爱茹

责任编辑: 王 艳

装帧设计: 吴小敏

责任校对: 罗 金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64041652(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30×1020 1/16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0316-5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我一直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	
——邓小平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1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	
——邓小平与莫斯科中山大学	11
25 岁的红七军、红八军政委	
——邓小平与百色、龙州起义	17
中央苏区的“毛派”头子	
——邓小平与中央苏区的反“罗明路线”	24
根据地建设的三大任务:建党、建军、建政	
——邓小平与根据地建设	31
“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野战军的格局”	
——邓小平与上党、平汉战役	40
“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	
——邓小平与挺进大别山	49
“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邓小平与淮海战役	57
“交给你指挥了”	
——邓小平与渡江战役	64
“大迂回”与“大包围”	
——邓小平与挺进大西南	69
中国共产党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邓小平与成渝铁路	77
我们对西藏的十条,就是要宽一点	
——邓小平与西藏和平解放	86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	
——邓小平与反对高饶的斗争	93
“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邓小平与中共八大	101
“大跃进”带来大灾难	
——邓小平与“大跃进”	109
“对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应该有监督”	
——邓小平与七千人大会	114
“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	
——邓小平与《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制定	120
“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	
——邓小平与中苏论战	126
我一生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邓小平与“文化大革命”	137
毛泽东说:“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	
——邓小平与我们党“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	146
“四人帮”“组阁”梦的破灭	
——邓小平与四届人大	151
改革是从1975年开始的	
——邓小平与1975年的整顿	160
“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	172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与“两个凡是”的斗争	182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	
——邓小平与真理标准的讨论	187
“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	
——邓小平与恢复高考	194
要设法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邓小平与平反冤假错案	200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208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邓小平与农村改革 215

中日两国要世代友好下去

——邓小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220

“我是热心于中美关系的”

——邓小平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23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过步”

——邓小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241

“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定都不如不做”

——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48

“杀出一条血路来”

——邓小平与经济特区 260

“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

——邓小平与中央顾问委员会 274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

——邓小平与台湾问题 281

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九龙

——邓小平与香港回归 290

我们虽然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有责任提出那个时候的目标

——邓小平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300

“我们不打别人的牌,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

——邓小平与“两个转变” 308

邓小平伸出一个指头:裁军一百万

——邓小平与百万大裁军 313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里程碑

——邓小平与澳门回归 320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邓小平与中苏关系正常化 326

“没有改革开放,‘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

——邓小平与 1989 年的政治风波 338

江泽民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邓小平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确立 346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与南巡谈话 352

武装全党的理论武器

——邓小平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367

“我一直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

——邓小平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一批中国的优秀分子和进步青年率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1920年，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开始出现了第一批中国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

“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的广大青年学生中间掀起了一场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从1919年至1920年，共有17批约1600多名青年学生来到法国，形成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空前规模。这些人中的进步青年在勤工俭学的同时开始研究和探索马克思主义。1921年3月，张申府、刘清扬与旅法留学生领袖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秘密成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海外的中国革命者也积极筹划建立共产主义组织。1922年6月，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三国的18名勤工俭学中国留学生齐集法国巴黎郊区的布洛涅森林举行会议，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一座小旅馆内。

邓小平于这年夏季正式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邓小平，1904年8月生于四川广安。原名邓先圣，五岁入私塾时改名邓希贤。十岁考入广安县高小。毕业后升入广安县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邓小平曾这样回忆道：“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左右（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国家的影响

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萧朴生、汪泽楷两人。”

邓小平是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时逐渐接受革命思想的。因为这里聚集了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勤工俭学生,在他们的影响下,邓小平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如《新青年》等,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邓小平说过:“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他还说过:“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



邓小平1921年3月在法国留影。
摄于里昂共和国路48号美国照相馆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于8月1日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少年》每月一期,到1923年7月改为不定期刊,共出了13期。它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当时正处在建党建团的初期,因此《少年》用相当的篇幅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宣传建党建团的意义,刊登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译文。赵世炎、周恩来等都曾在上面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开始是在《少年》编辑部工作,据蔡畅回忆:“《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蜡板,李富春同志发行。后来该刊物改名《赤光》。有时是三日刊、二日刊、月刊,时间不定。”“邓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全部脱产。”

“油印博士”

1923年2月,邓小平参加了“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会上,“少共”更名为旅

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6月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开始参加支部工作。

据江克明回忆:“1923年夏天,学校放暑假后,我同乔丕成到巴黎找临时工作。在这个时候,恰好召开旅欧共青团第二次代表大会改选领导。我俩都作为代表参加了。会上产生了书记局,由周恩来任书记,李富春任宣传,尹宽任组织,傅钟、邓小平同志也是负责人。会上决定改《少年》为《赤光》,但实际上到1924年2月才实现改版。”

从这时开始,邓小平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建立起深厚友谊。50多年后,邓小平对外国记者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的机关刊物《少年》,其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

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4年2月《赤光》正式出版后,邓小平和周恩来、李富春等人在《赤光》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进行革命宣传。

《赤光》是半月刊,16开本,每期十多页。到1925年止,一共出版了33期,在勤工俭学生、华工、华人范围内影响很大。邓小平以“希贤”的本名发表的文章有:《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人之大肆捏造》(1924年11月1日第18期)、《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1924年12月15日、1925年1月1日第21、22期合刊)。他还用化名写过一些文章。后来他自己这样说过:“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

曾琦、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在旅欧留学生中,标榜信仰国家主义,人们习惯称他们为“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以法国为中心,以《先声》周报为阵地,标榜“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共产党员加

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

面对国家主义派的攻击和挑衅,旅欧党团组织给予了严厉的驳斥,同他们在理论上、政治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等曾在《赤光》上连续发表了《革命救国论》、《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对国家主义派进行批驳。

邓小平还负责《赤光》杂志的刻蜡板和油印工作。他经常是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在那狭小的房间里,周恩来将写好或修改好的稿件交给他,邓小平把它一笔一划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再装订起来。为了保证每半月出一期,每期12页左右的内容,周恩来、邓小平一同忘我地工作着。经常是深夜工作完成后,邓小平就在这小房间里

打上地铺和周恩来住在一起。这段时间,邓小平和长他6岁的周恩来十分接近,邓小平很敬重这位兄长式的同志和领导,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邓小平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工作成绩给其他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有“油印博士”的美誉。

邓小平的弟弟邓垦也回忆说:“他去法国的时候,写过长信回家,其中有一条,就是他从事革命活动,不能回家了。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家里。当然,家里嘛,父母特别是我母亲很着急的,就盼望着他回家来,旧社会,老太婆嘛,希望他回家,这一下不能回家了。

“他在法国参加革命后,曾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办一份杂志《赤光》。他经常往家里邮寄,寄了七八期。我当时才十几岁,还在念小学,只看到封面上有光身子的小孩,里面内容看不太懂,到我念中学后,逐步看懂了,什么帝国主义侵略、劳苦大众、劳农政府、翻身解放、苏维埃、人人平等、为穷人谋利益等等,我后来去上海找他,参加革命,最早受的影响就是大哥寄来的《赤光》。”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机关刊物《赤光》封面

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



1924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法国巴黎合影。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当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执委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和周唯真、余增生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书记局,邓小平具体负责抄写油印及财务管理。根据党的规定,当时担任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支部)领导的邓小平,就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

这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又一个转折点。这时他还不满20岁。

1924年12月,邓小平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决议支部下设监察处,邓小平当选为监察处成员之一。会后,被委托为工人运动的负责人之一。第二年春,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被派到里昂地区工作,任宣传部副主任、青年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并兼任党的里昂小组书记,作为那里的党团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同时在里昂做工。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掀起了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斗争。

6月7日,由中共旅欧支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联合发起的赤光社、留法勤工俭学生总会旅法华工总会等28个团体代表参加的旅法华人大会在巴黎布朗街94号社会厅召开。大会声讨了

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声援了中国工人、学生和商人的正义反抗斗争。大会还成立了“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会议决定6月14日旅法华人在巴黎举行游行,向欧洲帝国主义示威抗议。

原定的游行示威由于法国当局横加制止和重重阻挠,以致最后被武力破坏而未能成功。于是“行委”决定变更方式,改在中国驻法公使馆内示威。6月21日下午1时,几百名旅欧华人到巴黎社会厅集合,举行了“临时紧急大会”,通过了几项要求后,即分乘20多辆汽车向位于巴比伦街57号的中国驻法公使馆进发。

一到使馆,参与者立即分头行动,有的把守大门,有的占领电话机,有的负责切断对外交通。在使馆外面担负援助侦察的人把事先准备好的旗帜、标语悬挂在使馆大门和围墙上,上面写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是中国人民的”等口号,并向行人和围观者散发法文传单。

使馆内的群众将公使陈箴团团围住,并质问道:“自从上海爆发反帝运动以来,几乎一个月,你丝毫无所表示,今天就是来质问你的,并叫你做一点事情。我们代表28个团体,3000多名旅法华人叫你签几个文件,援助国内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你应尽的责任!”说着,便把事先印好的电报、通知等文件放在他面前,叫他签字盖章。陈箴起初拒绝,继而不敢开腔,最后不得不在所有的文件上签字盖章,并保证旅法华人今后有行动自由和示威安全。至此,预定的全部工作都已完成。

这时,使馆外的同志报告说,大批警察正在向这里开来。于是大家一起撤出使馆,分散行动。就这样,一场漂亮的斗争不到一小时就胜利结束了。这是旅法华人在欧洲中心——巴黎所取得的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重大胜利。

“因为我比较活跃。我们的行动法国警察都是清清楚楚的!”

旅法华人这场斗争震动了法国,也几乎震动了整个欧洲。法国当局惶恐不安,派出大批警察,四处检查搜索,掀起了一场逮捕和遣返的浪潮。6月22日,法国政府命令警察大肆搜捕旅法的中国共产党人。几天之内,中共旅欧领导人任卓宣、李大章以及中共党员、青年团员20多人相继被捕入狱,随后,法国当局又将47名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驱逐出境。6月24日,中共旅欧支部决定:今后革命活动均以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名义进行。

邓小平回忆说:“因在巴黎的负责同志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而被驱逐,党的书

记萧朴生同志曾来急信通告,并指定我为里昂-克鲁梭一带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克鲁梭一带的一切工作。当时,我们与巴黎的消息异常隔绝,只知道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了,进行必甚困难。同时,又因其他同志的催促,我便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到巴黎后,朴生同志尚未被逐,于是商议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不久便又改为非常执行委员会,我均被任为委员。”

邓小平回到巴黎,自动接替了党团组织的领导。1925年6月30日,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邓小平为委员,和傅钟、毛遇顺三人组成书记局,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邓小平等人的活动,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尽管他没有被捕或驱逐,但同样受到了法国巴黎警察局的跟踪和监视。巴黎警察局派出情报员、密探监视邓小平等人的住地和聚会的场所,并掌握了一些情况,这使我们今天能够根据法国有关部门的一些档案中的监视跟踪记录来了解邓小平在法国最后一段时间工作斗争情况,这是难能可贵的历史资料。现存的法国国家档案中,关于邓小平他们的活动有不少记载:“1925年7月1日,在比扬古尔市特拉维西尔街14号召开一次会议,共有三十三人参加。会议主席首先讲话,说,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均已被逮捕,所以有重新组建的必要。此外,最近将要用法文和中文印刷抗议声明,以便在巴黎散发。会上,反欧洲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表示,坚决反对法方驱逐中国同胞的行径,尤其是对本星期六还要驱逐十名中国人表示强烈愤慨。当饭店的老板进来说警方来了时,会议就结束了。”

“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昨天(7月2日)下午在布瓦耶街23号召开会议,抗议国际帝国主义,共有七十多人参加。该委员会主席说,我们成立了行动办公室,其人员组成尚未上报代表大会,待小组选举。会上共有八人发言,其中邓希贤的主张为反对帝国主义,应同苏联政府联合。”

8月17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委会,由傅钟、邓小平、施去病三人组成书记局。

傅钟、邓小平、邓绍圣等人还在党团刊物上担任投稿人。

8月20日,法国警方查明邓小平此时住在比扬古尔市卡斯德亚街3号。

法国国家档案中1925年9月9日记录:“9月6日,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了一次会议,有四十多人参加。自从中国公使馆事件发生后,部分中国共产主义者居住在巴黎地区,并采取了紧急措施。以防被人发现。此会的目的,是为纪念廖仲恺先生。调查待继续进行,以便进一步摸清会议的组织者和与会者。”

10月24日,邓小平主持了一个有25人参加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会议,讨论

重建旅法中共组织机构问题。这件事在法国国家档案中也有记载：“昨天（即10月24日）20点至21点30分，在伊希－莫利诺市夏尔洛街一家咖啡馆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者会议，共有25人参加，会议由邓希贤主持。吴琪宣读了共产主义教育课，并指出，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创办刊物的必要性。”

11月15日，邓小平在巴黎主持举行了一次国民党的群众大会，纪念国民党旅欧负责人王京歧，并揭露国际帝国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对进步人士的迫害。第二天，法国情报员即报告说：“国民党于11月15日15时至17时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共有47人，会议由邓希贤主持。此会为纪念被法国驱逐，并死于回国船上的王京歧，会上陈希（音）等11名代表发了言，发言者抗议法国警察逮捕中国人。最后，邓希贤总结说：我们希望与会者永远牢记王京歧同志，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邓小平在法国共担任了一届半的支部领导，他的活动，已引起了法国警方的特别注意。法国警方开始秘密监视他，跟踪他的行踪。

邓小平自己说：“因为我比较活跃。我们的行动法国警察都是清清楚楚的！”

1926年1月3日，在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向与会的70多人发表演说。他主张努力促进并支持冯玉祥将军与苏联和解，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他特别提出，应“团结苏联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对邓小平的发言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后投票通过了一份致中国驻法公使陈篆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一、向法国政府和巴黎的外交使团抗议他们所奉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二、致电中国驻各国的使节，敦促他们向所驻国政府提出抗议，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抗议派军舰和军队到中国屠杀中国人民。”显然，这次会议是声援“五卅”运动游行示威的继续，它说明，旅法华人的反帝斗争，在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下仍在继续着。

1月7日，法国警方得到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这个报告说：“据本月5日获得的情报，旅法中国人小组行动委员会曾于1月3日下午，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好几个讲演的人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并要求在法国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支持冯玉祥的亲共产党、反对北京政府的政策。

“行动委员会在会上还决定要求中国驻巴黎的公使先生对中国的南北冲突表明立场，并起来反对任何国际干涉。

“由于行动委员会的组织非常审慎，虽对其进行了调查，但未能发现这个委

员会的所在地及其组成人员。然而,在1月3日会议上发言的几个中国人已被辨认出来了。

“他们中的一个人叫邓希贤,1904年7月12日出生于中国四川省邓文明和淡氏夫妇家。他从1925年8月20日起就住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市的卡斯德亚街3号。他符合有关外国人的法律和政令的规定。他于1920年来到法国。开始,他在马赛做工,后又到巴耶、巴黎和里昂。1925年他重新回到巴黎后,在比扬古尔的雷诺厂当工人,直到本月3日。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特别主张亲近苏联政府。

“此外,邓希贤还拥有许多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中国和苏联的来信。

“有两个中国同胞与邓希贤住在一起,好像他们也都赞成邓希贤的政治观点。外出时,他们总是陪伴着邓希贤。傅钟,1903年6月出生在中国(实应为1900年出生),Ping-Suen-Yang,20岁,生于上海。他们符合外国人在法国的法律,声称是学生,没有从事任何工作。

“由于在巴黎的中国人很封闭,了解他们的情况很难。为了弄清情况,看来有必要通过警察总局局长先生的允许,对他们在比扬古尔的几个住地进行访问调查。可以通过房主搞清一些情况,这样就有可能通过检查身份证了解他们中间的被通缉的共产党人。

“有三家旅馆应密切监视:卡斯德亚街3号,特亚维西尔街14号,朱勒费里街8号。”

1995年,当中国记者为拍摄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前往法国拍摄采访时,在法国国家档案局查到了一些留存了70年的档案材料,从这些档案中可以看出从1925年6月起邓小平就成为法国警方监视的对象,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档案当中。法国警方根据掌握的邓小平活动的详细情报,决定于1月8日对邓小平等人的住所进行搜查,并决定驱逐邓小平等3人出境。这个命令是1926年1月8日签署的。在保留至今的这份命令上还注明了“面交”三字。但是,他们晚了一步,搜查扑空,邓小平等人已于7日晚上离开法国。据警方的搜查报告说,执行警察局长的命令,8日早晨5时45分至7时,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对朱勒费里街8号、特亚维西尔街14号、卡斯德亚街3号三家旅馆进行了搜查。“搜查这三家旅馆的目的,是为了查找从事共产主义宣传中的中国人。这些旅馆的全部房间已被搜查过,上百份中文文件都被查看过。”“在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的5号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法文和中文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中国

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 ABC》等),中文报纸,特别是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报纸《进步报》,以及两件油印机的必须品并带有印刷金属板、滚筒和好几包印刷纸。”“名叫邓希贤、傅钟和 Ping Suen Yang 的三个人在这个房间里一直住到本月 7 日。他们昨天突然离去。而住朱勒费里街 8 号的名叫 Mon Fi Fian 和 Tchen Kouy 的人,也同时匆匆离去。这些中国人看来是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看来这些人由于发现自己受到怀疑,因此,就急忙销声匿迹了。他们的同胞采取了预防措施,丢弃了一切会引起麻烦的文件。”

这时的邓小平已经踏上了奔赴莫斯科的征程。